

【特稿】

“五四”学术遗产的再思考：
以胡适的《镜花缘》诠释为例

Rethinking Intellectual Legacies of the “May Fourth Period”: The Case of Hu Shih’s
Interpretation of *Ching-hua yüan* (Flowers in the Mirror)

潘光哲* (台湾中央研究院)

Pan Kuang-che

Academia Sinica, Taiwan

E-mail: mhkcp@gate.sinica.edu.tw

Published online: 31 December 2021

To cite this article (APA): Pan, K.- che. (2021). “五四”学术遗产的再思考：以胡适的《镜花缘》诠释为例. *ERUDITE: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and Education*, 2(2), 1-16. <https://doi.org/10.37134/erudite.vol2.2.1.2021>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37134/erudite.vol2.2.1.2021>

摘要

“五四”做为现代中国的耀眼时代，不应忽视“五四”知识人在这段期间推动的学术事业及其遗产的回响。本文以胡适对于《镜花缘》的述说为例，就此一面向，略抒要义。胡适认为，《镜花缘》是“一部讨论妇女问题的小说”，指陈是著作者李汝珍主张“男女应该受平等的待遇，平等的教育，平等的选举制度”的意见，自从1923年公开问世以来，对此后关于《镜花缘》及李汝珍的诠释和理解，俨然占有典范地位。若将胡适对妇女问题的论述“脉络化”，正可想见，他对《镜花缘》和李汝珍的诠释，其来有自；而其子遗，影响深远。藉此个案，正可凸显“五四”的学术遗产，对现代中国学术思想之建构，确实丰厚无己。

关键词：胡适、《镜花缘》、李汝珍、现代中国、整理国故、女权思想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胡适纪念馆主任。

Abstract

Give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May Fourth period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the scholarly projects pursued by intellectuals of the time and their legacies deserve further exploration. Focusing on Hu Shih's interpretation of *Ching-hua yüan* (Flowers in the Mirror; hereafter *CHY*), an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Chinese fantasy fiction, this paper outlines some major threads of the May Fourth intellectual projects and their profound influences. For Hu, *CHY* was a fiction on the question of women's rights, with which the author Li Ruzhen advocated equalities in wellbeing, education, and opportunity between men and women. This interpretation became virtually canonic since its publication in 1923. By contextualizing Hu Shih's interventions in the "women question" of his time, we will be able to capture the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his interpretation of *CHY*, as well as its lasting significance. This case illustrates specifically how legacies of the May Fourth period shaped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thought.

Keywords: Hu Shih, *Ching-hua yuan* (Flowers in the Mirror), Li Ruzhen, modern China, reorganizing national heritage, feminist ideas

一.

胡适与周作人的情谊深厚，世所共知¹；他和其兄鲁迅的关系，反倒有些扑朔迷离，费人疑猜；更是有心之士可以大作文章的题目²。回归历史本来场景，胡适与鲁迅之间，不是没有共同的关心课题，中国小说史研究即为显例，而且彼此都注意对方的研究成果。以鲁迅来说，他的《中国小说史略》即使将李汝珍的《镜花缘》列为清代“以小说见才学者”的作品之一，鲁迅还是特别引征了胡适评价《镜花缘》³的基本主调，声言《镜花缘》一书：

关于女子之论亦多，故胡适以为“是一部讨论妇女问题的小说，他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男女应该受平等的待遇，平等的教育，平等的选举制度”……⁴。

回观鲁迅的思想育成历程，本来就与《镜花缘》脱离不了关系⁵。只是，当年他阅读《镜花缘》的时候，会从“讨论妇女问题”的角度来思考这部书的意义和价值吗？这当然是难可追索的答案；鲁迅的例子，却具体而微地显示了胡适对于《镜花缘》的阐释，很早就成为了替这部书鸣音定调的基本旋律，在此后的诠释世界里，绕梁不止⁶。

¹ 陈漱渝，〈两峰并峙双水分流——胡适与周作人〉，李又宁主编，《胡适与他的朋友》，第2集（纽约：天外出版社，1991），页273-316。

² 例如：谢泳编，《胡适还是鲁迅》（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

³ 胡适，〈《镜花缘》的引论〉（1923年2月至5月作），《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卷四，页119-168；又，胡适，〈中国最早的一部讨论妇女问题的书——《镜花缘》〉，《努力周报》，第60、61期（北京：1923年7月8日、15日），内容与前文基本一致；同一时期，胡适另有英文之作：Hu Shih, “A Chinese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en (Paper read before the Tientsin Rotary Club, February 7, 1924),” *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 No. 2 (April 1924), pp. 100-109, in Chih-P'ing Chou (周质平), edited, *Literature and Society, English Writings of Hu Shih*, Volume 1 (Berlin & New York: [S. l.]: Springer;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ub., 2013), pp. 25-31; 比中英文稿内容，略有出入，例如，中文稿述说林之洋被迫缠足的段落，出现在“用文学的技术，诙谐的风味，极力描写女子所受的不平等的，惨酷的，不人道的待遇”的论述脉络里（〈《镜花缘》的引论〉，页142）；英文稿则特别提出“将男性‘女性化’”（“‘Womanizing’ a Man”）的总结标题（Hu Shih, “A Chinese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en,” *English Writings of Hu Shih*, pp. 28-29）。

⁴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卷9，页259。

⁵ 周作人回忆，他们的祖父周福清，虽是翰林出身，却相当鼓励子弟“自由读书，尤其是奖励读小说，以为最能使人‘通’，等到通了之后，再弄别的东西，便无所不可了……他所保举的小说，是《西游记》、《镜花缘》、《儒林外史》这几种……”周作人，〈镜花缘〉（1923年），钟叔河（编），《知堂书话》（长沙：岳麓书社，1986），页102-104。

⁶ 相关讨论，参考：李仁渊，〈重访“女儿国”：清中叶以来关于“镜花缘”的性别论述〉，《台大历史学报》，期28（台北：2001年12月），页127-156、黎活仁，〈乌托邦与女性主义——近四十年有关“镜花缘”研究的回顾〉，《古典文学》，卷1期13（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5年9月），页135-164（感谢作者香港大学黎活仁教授惠示本文与澳门大学郑振伟教授之助力）；尔后如夏志清、郑明璃、黄克武等从“拥护传统”与“反传统”面向提出讨论，依复是以女性/性别问题为出发点，参考：李玉馨，〈反传

回归胡适的思想世界，他对妇女问题的关怀，是他关注整体社会问题的一环，而且早自少年时期即有表露，尔后始终陈说不已；他对《镜花缘》和李汝珍的这等诠释路向，其来有自⁷。不过，一旦将胡适的诠释“脉络化”，《镜花缘》和李汝珍会成为他的述说关注对象，其实也和他在“五四”时期擘拟藉的“整理国故”从而“再造文明”的理想追寻⁸，密切相关。藉此个案，正可凸显现代中国女权思想之建构，可以凭借的思想资源，固是丰富多样，却不能也不该忽视论者自身的思想脉络；亦可展示，“五四”的学术事业，实为现代中国学术思想之建构，不可或缺之要素。

二.

“誉满天下，谤亦随之”。胡适一生承负了无数批判；但是，像徐复观那样的批判者，其实不多；在徐复观笔下，胡适居然被指控是“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⁹。因为胡适在1961年11月6日于美国国际开发总署主办的“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上，发表了〈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变革〉（*Social Change Necessary for the Growth of Science*）为题的演讲，声称：

我认为我们东方这些老文明中没有多少精神成分。一个文明容忍像妇女缠足那样惨无人道的习惯到一千多年之久，而差不多没有一声抗议，还有什么精神文明可说？一个文明容忍“种姓制度”（the caste system）到好几千年之久，还有多大精神成分可说？一个文明把人生看作苦痛而不值得过的，把贫穷和行乞看作美德，把疾病看作天祸，又有些什么精神价值可说？

所以胡适主张，东方人必须学习承认东方文明中所含的精神成分（*spirituality*）实在很少，转而学习了解、赏识科学和技术决不是唯物的，乃是高度理想主义的（*idealistic*），乃是高度精神的（*spiritual*）¹⁰。

统与拥传统：论“镜花缘”中的女权思想》，《中外文学》，卷 22 期 6（台北：1993 年 11 月），页 108-120。

⁷ 江勇振，〈胡适、《镜花缘》、性别意识〉，《“胡适与中国新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等主办），2016 年 12 月 17-18 日），页 131-140。

⁸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胡适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卷四，页 164；罗志田即以“再造文明之梦”为主题撰述胡适的生命史，见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⁹ 胡适与徐复观的关系，参考：黎汉基，〈徐复观与胡适〉，潘光哲主编，《胡适与现代中国的理想追寻——纪念胡适先生 120 岁诞辰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页 74-101。

¹⁰ 胡适著、徐高阮译，〈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册 10，页 3803-3804。

胡适的这番述说，其实重弹旧调，至少早在1926年发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已然公之于世，只不过他在那里并没有举出妇女缠足为例证而已¹¹。胡适始终表明类似的观点，激烈批判缠足乃是“祖宗作的孽”：

“把女人当牛马”，这句话还不够形容我们中国人待女人的残忍与惨酷。我们把女人当牛马，套了牛轭，上了鞍辔，还不放心，还要砍去一只牛蹄，剃去两只马脚，然后赶他们去做苦工！

全世界的人类里，寻不出第二国有这样的野蛮制度！

圣贤经传，全没有拯救的功用。一千年的理学大儒，天天谈仁说义，却不曾看见他们的母妻姊妹受的惨无人道的痛苦。

既然“我们的老祖宗太对不住了我们的妇女”，自然带来“中国所以糟到这步田地”的结果¹²。胡适也尝批判宣称中国“固有文化”之“丰富”的论者，以为他们论断“光辉万丈的宋明理学”，不足一道：

……讲了七八百年的理学，没有一个理学圣贤起来指出裹小脚是不人道的野蛮行为，只见大家崇信“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吃人礼教：请问那万丈光辉究竟照耀到哪里去了¹³？

批判缠足和近代中国建构国族想象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¹⁴；胡适的这番论说，当然是其间的一环事业，他对《镜花缘》和李汝珍的诠释，对这一点也多所发挥。胡适指出，李汝珍笔下对女儿国的描写，可以视为他“理想中给世间女子出气伸冤的乌托邦”，因为李汝珍“用文学的技术，诙谐的风味，极力描写女子所受的不平等的，惨酷的，不人道的待遇”，堪称“《镜花缘》里最精彩的部分”。特别是《镜花缘》要角之一的林之洋，在女儿国既被国王选作王妃，又被迫缠足，“在女儿国御设的‘矫揉造作速成科’”里吃尽缠足苦头的故事，在胡适看来，实在义蕴深长：

几千年来，中国的妇女问题，没有一人能写的这样深刻，这样忠厚，这样怨而

¹¹ 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1926年6月6日），《现代评论》，卷4期83（北京：1926年7月10日），《胡适文存三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卷1，页3-23。

¹² 胡适，〈祝贺女青年会〉（1928年6月24日），《胡适文存三集》，卷9，页1171-1173。

¹³ 胡适，〈信心与反省〉（1934年5月28日），《独立评论》，号103（1934年6月3日），《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卷4，页483。

¹⁴ 参考：高彦颐著、苗延威译，《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台北：左岸文化出版，2007）；余例不详举引。

不怒。《镜花缘》里的女儿国一段是永远不朽的文学。¹⁵

胡适的诠释，自与他从少年时期就反对缠足的思想关怀，一脉相承。如其早于1906年参与《竞业旬报》笔政时期，就如是言之谆谆：

敬告我中国的女子，道：“你们若不情愿做废物，一定不可缠足，若缠了足，便是废物中的废物了。”¹⁶

少年胡适对女权议题之关怀，始终不已，他的思惟议论，固然不免受传统制约，却别有新诠¹⁷。可以说，胡适其实是带着向来的关心，诠释《镜花缘》的意义。以《镜花缘》开卷即征引班昭《女诫》而言，少年胡适几是逐句地批判《女诫》¹⁸，本来正与晚清时期各家（如何震）批判的声音同曲共调¹⁹，因之，他对李汝珍的这番征引，“视若无睹”，径自就其关怀，自做文章。又如，胡适与族叔人胡近仁讨论小说，推许《镜花缘》位居中国“古小说”里足列“都可不朽”之著的第四部，仅次于《水浒传》、《儒林外史》与《石头记》，认为阅读《镜花缘》，要特别注意“其见识之高”，因为“此书全书为女子抱不平，看其写女儿国一段何等眼光，何等魅力”²⁰。尔后，胡适向陈独秀发表自己品评中国小说的意见，固然推许《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与《石头记》为中国“第一流小说”，反而认为《镜花缘》只是“第二流”作品里堪称“佳作”之书，只是，这部书是中国“倡女权说者之作，寄意甚远。其写林之洋受缠足之苦一节，命意尤显”²¹；他对于《镜花缘》只是“第二流”作品里堪称“佳作”的赞誉，也得到钱玄同的呼应²²。胡适乃至认为，教授中学的国文课程，应该将小说纳为教材，《镜花缘》即可列入，因为是书“写林之洋在女儿国穿耳缠足一

¹⁵ 胡适，《镜花缘》的引论，页142-150。

¹⁶ 希强，《敬告中国的女子》，《竞业旬报》，第3-5期（1906年11月16日-12月6日），潘光哲主编，《胡适全集·时论》（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纪念馆，2018），册1，页5-11。

¹⁷ 参考：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1部，《璞玉成璧（1891-191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页102-106。

¹⁸ 铁儿，《曹大家女诫驳议》，《竞业旬报》，期37-39（1908年12月23日-1909年1月12日），潘光哲（主编），《胡适全集·时论》，册1，页267-279；参考：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璞玉成璧（1891-1917）》，页106-113。

¹⁹ 参考：夏晓虹，《古典新义：晚清人对经典的解说——以班昭与《女诫》为中心》，《中国学术》，辑2（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4月），页82-103。

²⁰ 胡适，《致胡近仁》（1915年7月13日），潘光哲主编，《胡适全集·中文书信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纪念馆，2018），册1，页139。

²¹ 《通信》，页9，《新青年》，卷3号4（1917年6月1日）；是函系年为1917年5月10日。

²² 只是，钱玄同对《镜花缘》否是为“倡女权说者之作”，未置一辞，反而批评李汝珍“太喜卖弄聪明，双声迭韵，屡屡讲述，几乎是‘文字学讲义’矣”，见：〈附录一 钱先生原书〉（1917年7月2日），胡适，《答钱玄同书》，《胡适文存》，卷1，页65。

段，是问题小说”，教员“应该使学生明白作者‘设身处地’的意思，借此引起他们研究社会问题的兴趣”²³。无论如何评断《镜花缘》的地位高下，他的阅读感怀，如出一辙。

在晚清时期《镜花缘》的读者群体里，类似关怀意旨的阅读响应，不一而足。如著名谴责小说家吴沃尧（吴趼人、我佛山人），不仅同样称誉《镜花缘》“独能决突藩篱，为女子一吐郁勃”，更表示自己“最喜其女儿国王强迫林之洋为妃与之缠足一段。其意若曰：‘汝等男子，每以女子小足为玩具，盍一返躬之，而亲尝其痛苦哉’”。约略同一时期，如无名氏的《负暄絮语》谓《镜花缘》言及“女书、女科，隐然有男女平权之意味”²⁴。同一时分，续赅《镜花缘》的说部作品，至少有四种问世：萧然郁生《新镜花缘》（1907-1908）、陈啸庐《新镜花缘》（1908）、华琴珊《续镜花缘》（1910）与秋人《镜花后缘》（1910），同样涉及晚清的妇女运动及相关议题；即便它们未必都是“伸张”女权之作²⁵，却显示在小说创作者的群体意识里，妇女议题，不可或缺。

共同浴身于晚清以降申张女权的意见气候（*climate of opinion*）²⁶里，胡适吟唱的基调，与同一时代的创作者/论者，其实并无二致。然而，吴沃尧等人对于《镜花缘》的称誉，问津者罕，有待后来者阐幽发微；相对的，胡适的阐释，却成为后来者必须接棒启步的起点，其中玄机，自与学术之变迁及世风之转移，密切相关²⁷。毕竟，胡适得以成为“一代宗师”，其打造转成，实有其文化/社会基础²⁸，胡适阐释《镜花缘》，得以生生不息，亦复如是。

²³ 胡适，〈中学国文的教授〉，《胡适文存》，卷一，页310。

²⁴ 本段述说，参照：李仁渊，〈“重访女儿国”〉，页136-137。

²⁵ 这四部小说之研究，笔者所见最为完整的论述为：苏恒毅，《晚清四部拟《镜花缘》小说的妇女议题研究》（台南：国立成功大学，中国文学系硕士论文，2015）；余例不详举。

²⁶ 意见气候（*climate of opinion*）是美国史家 Carl Lotus Becker 在 *The Heavenly City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hilosophers*（1932）创造的概念，就最广泛义意而言，意指个人在本能上怀持的先入之见（*those instinctively held preconceptions*），此一述说，自是其倡言历史相对论（*historical relativism*）的产物，相关论述，参见：Robert Allen Skotheim, *American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Historians*（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pp. 87-109。

²⁷ 正如艾梅兰（Maram Epstein）所言，后继者都接受了胡适的诠释，但是，将才貌双全的年轻女子理想化，是清代小说共同的譬旨（*trope*），因此《镜花缘》的理想化笔法，并不是非典型的（*atypical*），见：Maram Epstein, *Competing Discourses: Orthodoxy, Authenticity, and Engendered Meanings in Late Imperial Chinese Fiction*（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1），p. 251。

²⁸ 参考：沈松桥，〈一代宗师的塑造——胡适与民初的文化、社会〉，周策纵等著，《胡适与近代中国》（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1），页131-168。

三.

一代宋史名家邓广铭和胡适的师生情谊，向是学林佳话²⁹；出身鲁国故土乡野的他，是在高等小学教师那里见到《胡适文存》，方始第一次知道胡适之名；1923年，邓广铭到了济南，就学于山东第一师范，校长王祝晨更是新文化运动的呼应者，乃至当《胡适文存二集》于1924年出版后，他竟要求学生，能买的都买一部³⁰。《胡适文存》的流通阅读史，由此当可得一例证，那是高等小学的教师与师范学校的学生，可以共同分享的思想资源。

胡适其他著作的出版数量，也可以做为他的社会影响力的指标之一。胡适的多种著作原先多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³¹，他的新诗集《尝试集》，开风气之先，至1953年亚东图书馆结束营业为止，总印数为47,000册，数量远远超过郭沫若等人那部也广受好评的《三叶集》³²；另据在上海亚东图书馆工作过的汪原放的回忆述说³³，可以将胡适著作的出版数量初步整理如下表³⁴：

书名	时间	印数（册数）	资料来源
《胡适文存》	1921年12月15日初版	4,000部	页75
	1922年年底	共印三版，12,000部	页82
	1928年	十版以上（册数不详）	页139
《胡适文存二集》	1924年初版	4,000部（每部4册）	页103
《四十自述》	1933年	5,000册	页176
《胡适文选》	1933~1934年间	4,000册	页176

²⁹ 即便如聂文华论证，邓广铭开展宋史研究，渊源所自，是他于北大修习蒙文通开设宋史课程的启发（聂文华，〈邓广铭宋史研究学术渊源考〉，《史学月刊》，2015 年期 3（开封：2015 年 3 月），页 17-23）；但是，邓广铭得以进入（以宋史为专业的）学术研究世界，更赖于胡适（及傅斯年）的奖励提拔。

³⁰ 邓广铭（口述），闻黎明（记录），〈我与胡适〉，郜元宝（编），《胡适印象》，《印象书系》（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页 99-100。

³¹ 上海亚东图书馆的主人是汪孟邹，与胡适为安徽绩溪同乡，两人的关系与交谊，见：沈寂，〈胡适与汪孟邹〉，李又宁主编，《胡适与他的朋友》，第 1 集（纽约：天外出版社，1990），页 345-389。

³² 按，《三叶集》的总印数为 22,950 册，见：沈寂，〈胡适与汪孟邹〉，页 365（但是，沈寂未说明史料来源）。

³³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

³⁴ 本表“资料来源”，即指：汪原放的《回忆亚东图书馆》一书的页数（下表同）。

其他著作也由亚东图书馆出版的“五四”人物，其出版情况则如下表：

书名	时间	印数(册数)	资料来源
《吴虞文录》	1921年9月初版	3,000部	页75
	1922年年底	共印二版, 5,000部	页82
	1928年	五版以上(册数不详)	页139
《独秀文存》	1922年11、12月左右初版	3000部	页75
	1922年年底	共印二版, 6,000部	页82
	1922年初版, 至1927年止	共印29,000部(版数不详)	页168
	1933年重印, 至1934年止	共印3,000册	页168

大体而言，胡适著作的出版数量，都超过同代人物。这样的现象，应当可以显示胡适的著作确实拥有一定的读者群，是他能够在“思想市场”上充当“青年导师”的“社会基础”³⁵。可以说，胡适的著作既广泛流通于“文化市场”，他的言论自可能如水银泄地，广传世众，蔚为共识，诸人立论而往往不自知承袭所在。即以胡适初始倡言“整理国故”的意旨而言，他的宣示是：

……我们对于旧有的学术思想，积极的只有一个主张——就是“整理国故”。整理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为什么要整理呢？因为古代的学术思想向来没有条理，没有头绪，没有系统，故第一步是条理系统的整理……第二步是要寻出每种学术思想怎样发生，发生之后有什么影响效果……第三步是要用科学的方法，作精确的考证，把古人的意义弄得明白清楚。……第四步是综合前三步的研究，各家都还他一个本来真面目，各家都还他一个真价值。³⁶

³⁵即如胡适自己更从总字数达一百四、五十万的三集《胡适文存》里有意识地“选出了二十二篇论文”，在1930年由亚东图书馆出版《胡适文选》一书，“预备给国内的少年朋友们作一种课外读物”，见：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选》，《胡适作品集》（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6）；朱自清即认为，《胡适文选》“是一部值得读的好书”，故撰有《〈胡适文选〉指导大概》，做为高中生阅读的指引，见：朱自清，〈《胡适文选》指导大概〉，收入：欧阳哲生编，《再读胡适》（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1），页301-332。

³⁶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胡适文存》，卷4，页164。

后起者的观点，则如学舌鹦鹉，再三重复胡适的基本论调。像是与胡适关系密切的顾颉刚³⁷，呼应之言就是：

……立在家派之外，用平等的眼光去整理各家派，或向来不入家派的思想学术，我们也有一个态度，就是：“看出牠们原有的地位，还给牠们原有的价值”。……³⁸

那时的顾颉刚，积极参与了文学研究会主导的《小说月报》，是刊也一度是“整理国故”的呼应基地³⁹，真实身分不详的“润生”，做为读者，心有所感，写信给该刊，强调整理中国文学实是“今日切要急需之图”，入手之方则为：

……用科学的方法、实验的态度、现在的思想、平等的眼光，整理研究一番，各给他个真价值……⁴⁰。

顾颉刚广涉胡适的诸种著作，实证历历⁴¹；“润生”是否必然也是胡适著作的读者，大概难能证明。只是，比较对观，不能不说，胡适的言论思想与治学主张，确实一度鼓动青年世众，在他们的思想血管里，涌动不已。

何况，身为号召“整理国故”的旗手，胡适非仅停留在喊口号、贴标语的层域而已，他以自己的诸种著作，示范了迈步前进的康衢正道，究竟何在。以胡适对于《镜花缘》的诠释而言，后来者自是着重其间述说女权问题的面向，却大多忘记了他这篇〈《镜花缘》的引论〉的本来面貌，是为上海亚东图书馆推出《镜花缘》新式标点本而撰写的序论。

这项由汪原放经手的工作，以1920年出版《水浒传》新式标点本为起点，始终得到胡适的支持（乃至规划）⁴²；抑且，这样的工作，更被胡适自视为“整理国故”

³⁷ 季维龙，〈胡适与顾颉刚的师生关系和学术情谊〉，沈寂主编，《胡适研究》，辑2（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页223-253。

³⁸ 顾颉刚，〈我们对于国故应取的态度〉，《小说月报》，卷14号2（1923年2月），页3。

³⁹ 罗志田，〈新旧能否两立：二十年代《小说月报》对于整理国故的态度转变〉，《历史研究》，2001年3期，页11-16。

⁴⁰ 〈通信〉，页1，《小说月报》，卷14号2（1923年2月）。

⁴¹ 如《胡适文存》于1921年12月15日初版，顾颉刚于1922年1月13日开始阅读，翌日续读是书之外，还阅读胡适的〈《西游记》序〉，《顾颉刚日记》（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7），册1，页200-201。

⁴² 谢慧，〈胡适与上海亚东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7年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页484-487。

的工作内容。他回忆说，要求亚东图书馆推出这些古典白话小说“有系统的整理出来的本子”，工作内容包括三个部分：一、本文中一定要用标点符号；二、正文一定要分节分段；三、一篇对该书历史的导言⁴³。这篇《〈镜花缘〉的引论》，正是胡适自我实践这些要求的展示之一。

举例而言，胡适为了勾勒《镜花缘》作者李汝珍的生平与交游，引征了《李氏音鉴》的相关资料（这部书是钱玄同告诉他的）；胡适为了知晓李汝珍的功名，检查他出身所在（顺天府大兴县）之《顺天府志》里的《选举表》、《艺文志》与《人物志》，一无所获，由于《顺天府志》《选举表》纪录的“举人进士队里都没有他”，胡适揣度：“可见他大概是一个秀才，科举上不曾得志”。虽然《中国人名大辞典》有李汝珍的小传，胡适却认为其间批评李汝珍在音韵学上的成绩，实在太过“严酷”，反而“只足以表示批评者自身的武断”。相对的，胡适举引李汝珍《李氏音鉴》里的论说，阐明李氏“对于音韵学上地理的重要，何等明了呀！只此一点，已足以‘前无古人’了”⁴⁴。至于胡适论断《镜花缘》述及的“那些海外国名，一一都有来历；那些异兽奇花仙草的名称，也都各有所本”，则加添注语表示依据所傍是钱静方的《小说丛考》⁴⁵。凡此诸端，可以显示，胡适出以广泛访求研究对象相关的版本、材料与典籍的方式，开展《镜花缘》（乃至小说史）研究，自可为后来者提供烛照之益。

胡适曾经批评所谓“鸳鸯绣取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是一种“很可鄙的态度”，他认为，身为“提倡学术的人应该先把‘金针’送给大家，然后让他们看我们绣的鸳鸯，然后教他们大家来绣一些更好更巧妙的鸳鸯”⁴⁶。胡适的这篇《〈镜花缘〉的引论》，迅即犹如《镜花缘》（与李汝珍）研究的“金针”，取而用之者，众多难言。即如孙佳讯“寻得了许多海州学者的遗著”，不仅将具有“革新思想”的李汝珍的“历史考的更详细了”，更修正了胡适《〈镜花缘〉的引论》里许多的错误。孙佳讯仿胡适之道却还治其身，自然深得胡适的欣赏，乃至竟将彼此往还的信函，公之于世⁴⁷，展现胡适深庆后继有人的喜悦。

⁴³ 胡适著、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页236。

⁴⁴ 胡适，《〈镜花缘〉的引论》，页119-120、134-135。

⁴⁵ 胡适，《〈镜花缘〉的引论》，页137；钱静方的《小说丛考》，应是当时学人普遍征引的前行研究，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述及《封神传》，亦引用之（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页177；余例不详举）；关于钱静方《小说丛考》，目前知晓，钱静方（1875-1940），本名钱学坤，1909年贡生，曾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攻警务；《小说丛考》，原连载于《小说月报》，商务印书馆1916年初版，见：王振良，《稗谈书影录》（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页32-36。

⁴⁶ 胡适，《国语语法概论》，《胡适文存》，卷3，页35-36；尔后，胡适的表述则为“鸳鸯绣取从君看，要把金针度与人”。胡适，《〈醒世姻缘传〉考证》，《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页333。

⁴⁷ 《关于〈镜花缘〉的通信》，《胡适文存三集》，卷6，页859-860；此后孙佳讯穷近半世纪之力，研究李汝珍与《镜花缘》而不辍，且集结为专书，见：黎活仁，《乌托邦与女性主义——近四十年有关“镜花缘”研究的回顾》，页137。

四.

众所周知，傅斯年虽然是胡适的学生，两人交谊实在师友之间，傅斯年对胡适的思想 / 学术历程，更有重大的影响⁴⁸。1920年初，傅斯年赴欧求学；两人一别，至1926年方始有缘再见。当时傅斯年致函胡适，指陈胡适的《哲学史》固有“一时刺动的效力”，就书的长久价值言之，胡适的小说评论反而“居先”⁴⁹。胡适深喜傅斯年的这段评论，表示自己投注大量心血的小说史研究工作，其实更还带有“做学问的方法”的示范意义：

……关于第二层，——小说的考证，——我也很高兴。老实说，这十年来，没有一篇文字费去的时间与精力有《〈水浒传〉考》、《〈红楼梦〉考证》那样多的。我那次病倒，也就是从第一篇《〈水浒传〉考证》得来的。但我的辛苦已得了过望的酬报了。几部第一流小说的作者的事实都次第发现了，这差不多是一种“生死人而肉白骨”的功德！最大的报酬却是一些“副产物”（by-products）。我的本意本是想提倡一种方法，做学问的方法。颉刚在他的《古史辨》自序里说他从我的《〈水浒传〉考证》里得着他的治史学方法。这是我生平最高兴的一件事。⁵⁰

胡适带着这等要在方法论的层域里要向后起之秀提供示范作用的自我期望，开展小说的研究，成绩所在，昭彰显著；在他号召“整理国故”的诸项行动里，至今依然遗泽犹存⁵¹。况且，胡适的诸多著作，往昔一度广泛流通，阅读者众，他的言论思想及治学主张、路数和成果，可以是青年世代同润共享的思想资源。他从申张女权的角度而开展对于《镜花缘》（和李汝珍）的阐释，俨然雄辩滔滔，脉络清晰而又证据充分地勾勒了其书其人，实如形构时代意见气候的领航者⁵²。

⁴⁸ 参见：朱宗震、吕景琳，〈傅斯年——胡适的学生和诤友〉，李又宁主编，《胡适和他的朋友》，第4集（纽约：天外出版社，1997），页219-268、王汎森，〈傅斯年对胡适文史观点的影响〉，《汉学研究》，卷14期1（台北：1996年6月），页177-193。

⁴⁹ 〈傅斯年致胡适〉（1926年8月17、18日），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1），卷1，页44。

⁵⁰ 胡适，〈致傅斯年〉（1926年8月24日），潘光哲主编，《胡适全集·中文书信集》，册2，页44。

⁵¹ 参考：陈平原，〈胡适的文学史研究〉，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学术史丛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页193。

⁵² 复且，胡适《〈镜花缘〉的引论》一文，经张我军删节易名为《〈镜花缘〉是一部讨论妇女问题的书》，刊登于《台湾民报》（1925年8月23日），张我军删节的是胡适对于女子参政与女子教育的议论，而仅聚焦在缠足与穿耳的身体解放和破坏礼教束缚等议题之上。凡此可见，由于台湾 / 中国的现实脉络之差异，胡适的本来关怀，未必为如张我军这样的读者，全盘接受，参考：沈芳序，〈对胡适文学

这样，当年反对 / 批判胡适的阐释者的意见，好似被抛在九霄云外。如陈望道声言道，《镜花缘》“表彰的却是女子的学问才德，即作者自己说的‘妇德’”这部书的特殊贡献只在“泣诉抗议，不在解决问题”，胡适竟将“反面的形容为正面的主张”⁵³，总不是《镜花缘》的研究者注意的观点。反而，任何有意涉足于《镜花缘》与中国女权思想这个课题的后来者，都必须以胡适的研究为起点，或是补充深化，或是更予系统化⁵⁴，乃至提出挑战质疑⁵⁵。因此，如胡适在思想史上之地位，深具“典范”意义⁵⁶；他的《镜花缘》研究，对现代中国女权思想的建构，亦复如是。藉此个案，正可显示，诸如胡适这等在“五四”时期“头角峥嵘”的学术工作者，业绩所得，确实为现代中国学术思想之发展建构，奠定了基础，值得后来者再三致意。

思想的传播与接受：以分析场域（1923-1932）》，成功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博士论文（台南：2014年1月），页22-25。

⁵³ 陈望道的其他批判意见甚众，如言“……胡适不说李汝珍所见的是‘四德’，却说所见的是几千来忽略了妇女问题，大约便为闪避这些讲妇女问题者的攻击，同时又要把这书混进讲妇女问题的书册里头去，使它一同受人欢迎的缘故……”，不一一详引，见：陈望道，〈《镜花缘》和妇女问题〉，《女青年月刊》，卷13期3（上海：1934年3月），页43-54。

⁵⁴ 例如，鲍家麟大致重复胡适论述，指陈李汝珍是“中国最早提出妇女权利问题的人”；赖芳伶复再敷衍，表明李汝珍是“中国最早藉小说提出妇女权利问题的人”，《镜花缘》是“第一部把女性放在平等地位来尊重的古典白话小说”等等，见：鲍家麟，〈李汝珍的男女平等思想〉，鲍家麟编著，《中国妇女史论集》（一）（台北：稻乡出版社，1988〔再版〕），页221、赖芳伶，〈晚清女权小说的渊源及其影响〉，《文史学报》，期19（台中：国立中兴大学文学院，1989），页56；类似之论，不一而足，不一一详引。

⁵⁵ 即如白保罗（Frederick P. Brandauer）批评胡适未曾注意《镜花缘》征引班昭《女诫》，仍赞同胡适提出的《镜花缘》“是一部讨论妇女问题的小说”的意见，更进一步申论，胡适与其追随者，不能认识《镜花缘》其实反对特定的儒家理想女性，李汝珍确实提出了一种独特的妇女解放论述，见：Frederick P. Brandauer, “Women in the *Ching-hua yüan*: Emancipation Towards a Confucian Ideal,”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XXXVI, No.4 (August 1977), pp. 647-660; 夏志清未直接征引胡适，同样指陈《镜花缘》征引《女诫》的意义，“肯定了班昭的箴训”；也认为林之洋被迫缠足的段落，具有“明显的女权主义讽刺性”，见：夏志清著、黄维梁译，〈文人小说家和中国文化——《镜花缘》研究〉，《幼狮月刊》，卷40期3（台北：1974年9月），页18-29；抑或如李玉馨指陈，《镜花缘》“不能归类为女权主义小说”，见：李玉馨，〈反传统与拥传统：论“镜花缘”中的女权思想〉，页119；其他类似论述甚多，不一一详引。

⁵⁶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

【征引文献】

一、 专著

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1。

王振良，《稗谈书影录》，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

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江勇振，《璞玉成璧（1891-1917）—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1。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

李又宁主编，《胡适与他的朋友》，纽约：天外出版社，1991。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

沈寂主编，《胡适研究》，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

周策纵等著，《胡适与近代中国》，台北：时报文化公司，1991。

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张小虹，《时尚现代性》，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6。

钟叔河编，《知堂书话》，长沙：岳麓书社，1986。

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

胡适，《胡适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

胡适，《胡适作品集》，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6。

胡适，《胡适论学近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胡适著、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

郇元宝编，《胡适印象》，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

高彦颐著、苗延威译：《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台北：左岸文化出版社，2007。

欧阳哲生编,《再读胡适》,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1。

鲁迅,《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鲍家麟编著,《中国妇女史论集》,台北:稻乡出版社,1988。

潘光哲主编,《胡适全集·中文书信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纪念馆,2018。

潘光哲主编,《胡适全集·时论》,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纪念馆,2018。

谢泳编,《胡适还是鲁迅》,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

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7。

二、 期刊论文

王汎森,〈傅斯年对胡适文史观点的影响〉,《汉学研究》第14卷第1期,1996年6月。

李仁渊,〈重访“女儿国”:清中叶以来关于《镜花缘》的性别论述〉,《台大历史学报》第28期,2001年12月。

李玉馨,〈反传统与拥传统:论《镜花缘》中的女权思想〉,《中外文学》第22卷第6期,1993年11月。

罗志田,〈新旧能否两立?二十年代《小说月报》对于整理国故的态度转变〉,《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

夏志清著、黄维梁译,〈文人小说家和中国文化—《镜花缘》研究〉,《幼狮月刊》第40卷第3期,1974年9月。

夏晓虹,〈古典新义:晚清人对经典的解说—以班昭与《女诫》为中心〉,《中国学术》第2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

黎活仁,〈乌托邦与女性主义—近四十年有关《镜花缘》研究的回顾〉,《古典文学》第1卷第13期,台湾学生书局,1995年9月。

赖芳伶,〈晚清女权小说的渊源及其影响〉,《文史学报》第19期,台中:中兴大学文学院,1989年。

聂文华,〈邓广铭宋史研究学术渊源考〉,《史学月刊》,2015年第3期。

三、会议论文集

《胡适与中国新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等主办，2016年12月17、12月18日。

潘光哲主编，《胡适与现代中国的理想追寻——纪念胡适先生120岁诞辰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台北：秀威信资讯科技公司，2013。

四、学位论文

苏恒毅，《晚清四部拟《镜花缘》小说的妇女议题研究》，台南：成功大学中国文学系硕士论文，2015。